

皮与意气风发，共事同侪难忘他的远见卓识与执着担当，广袤的星空、无垠的宇宙已轻轻敞开怀抱，将他拥入绮丽的天际。

如今，FAST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突破1000颗，来自宇宙的奥秘就这样被听见、被解读、被述说。清华园里，仍有志同道合的青年学子并肩遥望天际，渴望终其一生，做一件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

2018年秋，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第

79694号小行星命名为“南仁东星”；2019年秋，南仁东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2025年秋，八年级语文教材新增课文《天上有颗“南仁东星”》。南仁东的“追星”足迹，将在一次次仰望与讲述中，被时时铭记。

八年已过，再呼唤一声“学长！”也许会有星光从银河深处传来——那是他的回应，轻快、明亮、永不熄灭。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陈维仁的秘书生涯

○程冠军

2025年10月3日，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陈维仁同志逝世，享年101岁。

陈维仁，1924年3月出生于云南武定县。1944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1947年1月在清华大学加入民主青年同盟，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历任《人民日报》编辑，中共中央党校办公室副主任、文史教研室副主任、进修部主任、副校长。1994年3月离休。

本刊摘编中国领导科学研究院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程冠军文章，以表达对陈学长的深切缅怀。

陈维仁早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后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宽厚正直，宠辱不惊——用这八个字形容陈维仁是最恰当不过了。

陈维仁说，他这一生最大的幸运就是上了两个有名的学校，先后跟了三个好当秘书。陈维仁所说的“两个有名的学校”是指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他所说的



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时的陈维仁

“三个好人”一个是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著名的史学家邓拓；一个是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党校校长林枫；另外一个是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

狮子山走出清华学子

云南楚雄自治州的武定县，有一座被称为“西南第一山”的狮子山。1924年3月4日，陈维仁出生在狮子山下的一个小

□ 怀念师友

山村里。童年时代，陈维仁读书就十分刻苦，以至于上私塾时，眼睛就开始高度近视，到了中学已看不清黑板。但因为家境不好，又配不起眼镜，只好总坐在教室第一排的位子上。

1944年7月，陈维仁考取了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是抗日烽火中，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联合组成的。抗战胜利后，因反对内战，昆明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一”学生运动，思想进步的陈维仁与同学们一起积极投入到了这场“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学生运动中。

西南联大集中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和爱国人士。这些学者中，陈维仁印象最深的就是费孝通、李公朴、闻一多。

“一二·一”运动时，费孝通带领学生在街头演讲，子弹在头顶飞来飞去，但他却毫无惧色。1946年5月，西南联大解散，陈维仁是最后一批离校的学生，6月底他与同学们北上清华。

在清华大学期间，陈维仁继续学习经济学。陈维仁对清华最美好的回忆就是听陈岱孙教授讲课。陈岱孙受过西方教育，他讲课非常严谨，个子高而挺拔，目光炯炯，每次上课总是西装笔挺，夹着光亮的皮包。他走上讲台，先是放下包，转身在黑板上用英文写下所讲的题目，然后再转过身来解开金光闪闪的手表放在讲桌上，便开始讲课。陈先生讲课深入浅出，口若悬河，头头是道，且没有一句废话，一直到最后一句话讲完，恰好下课的钟声也响了。陈维仁说，当时同学们都说，如果陈先生讲课结束，钟却没有响，那一定是钟出了毛病。这个猜想还真的发生了，有一次，陈岱孙说完“下课”之后，钟竟然没有响，最后发现真的是钟出了故障。

给邓拓当秘书

1947年，陈维仁在清华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次年8月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应届毕业生提前一年毕业，陈维仁的愿望是随解放军南下，但党组织却给他分配了另一个重要任务：中央决定将《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要选拔一批年轻干部去《人民日报》，陈维仁就到《人民日报》去当了一名编辑。

同年秋天，37岁的邓拓到《人民日报》担任总编辑（社长为范长江）。1954年，苏联《真理报》总编辑谢彼洛夫跟随赫鲁晓夫访华，报社安排陈维仁为邓拓整理谈话记录。邓拓对陈维仁的工作非常满意，便决定让陈维仁做自己的秘书。

邓拓为人和善，说话时总带着微笑，一派学者风度。刚做秘书工作时，邓拓找陈维仁谈话：“做秘书事务性的东西太多了，你本来应该在业务上有所发展，但不要着急，你也可以写文章。”

1955年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30周年纪念日。之前，邓拓对陈维仁说：“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30周年，《人民日报》要发表一篇纪念文章，你来写。”陈维仁感觉这个担子不轻，忙说：“我不了解孙中山逝世的情况啊？”

邓拓微笑着说：“你可以到国家图书馆查找一下当时的报纸，看一下群众对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反响，然后就会写这篇文章了。”陈维仁心中十分激动，这分明是手把手教自己写文章啊！

陈维仁依邓拓所言，写好稿子于3月10日下班前交给邓拓。邓拓说：“你先回去吧！我晚上看大样时再看。”虽然交了

差，但陈维仁心中还是没有底，回到家还一直忐忑不安。

第二天早上，陈维仁一到报社，就看到自己写的稿已经邓拓的修改并排出了清样，题目是《人民对孙中山的悼念》。翌日，这篇3000字的文章就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给林枫当秘书

1959年3月，陈维仁被安排到中央党校59班学习。当时，中央党校校长是曾担任过刘少奇秘书的林枫。林枫不仅担任中央党校的校长和党委书记职务，同时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3年，党校领导找正在学习的陈维仁谈话，让他留在党校为林枫同志当秘书。

陈维仁说，林枫在任校长期间，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着力改造了党校的知识结构，让时任中央党校教育长的蒋南翔在全国著名高校发通知，挑选一批年轻干部充实到党校的各个教研室。他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理念改善了党校的自然环境和知识结构。如今的中央党校树木成林、景色宜人，林枫同志功不可没。

“文革”期间，林枫遭到残酷迫害，被撤销中央党校校长和党委书记职务，并被抄了家。1968年3月，受尽非人折磨的林枫被逮捕关进秦城监狱，直到1972年才得以出狱。由于林枫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出狱后一直住在北京医院。1977年9月28日，生命垂危的林枫在病床上见了自己的老部下陈维仁和新任中央副校长胡耀邦最后一面，之后便离开了人世，终年71岁。林枫同志的冤死，对胡耀邦的刺激非常大，更坚定了他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心。每当提到与林枫的最后一

面，陈维仁总是禁不住地流泪。

给胡耀邦当秘书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1977年3月，胡耀邦同志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全面工作。

胡耀邦到党校时，陈维仁还属于“靠边站”的人。当时他正在香山劳动。中央党校组织部来找他谈话说，胡耀邦来党校需要一个文字秘书，让他回校工作。

陈维仁第一次见胡耀邦是1977年5月2日，正值五一放假后的第二天。陈维仁来到胡耀邦的办公室，胡耀邦一抬头首先看见了陈维仁，便微笑着问：“同志你找谁？”陈维仁已经猜想到眼前的这个人是胡耀邦同志，便说：“耀邦同志你好，我是陈维仁。”胡耀邦一听马上兴奋地说：“我等你好久了！你来了。”然后他顿了一下，指着桌子上的一堆文字材料半开玩笑地说：“我正在做你的工作。”陈维仁便不再拘束，赶快跑过去与胡耀邦握手。此后，陈维仁跟随着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开始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

解放思想首先是从创办《理论动态》开始的。胡耀邦到党校不久，便提出“要创办一个刊物”即《理论动态》，办刊人员都是胡耀邦亲自挑选的。为了办好《理论动态》，胡耀邦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经常为《理论动态》出题目、出思路、与大家一起讨论，并亲自修改文章。使《理论动态》在短时间内就成为党内最有影响的理论刊物。他把《理论动态》作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思想武器，要把“被颠倒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政治是非再颠倒过来”。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

□ 怀念师友

第60期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党、全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从而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胡耀邦同“两个凡是”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邓小平、罗瑞卿等老一辈革命家支持和推进了这场大讨论。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了评价，标志着这场讨论取得了最后胜利，从而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序幕。

一边解放思想，一边复校。陈维仁跟着胡耀邦，每天有使不完的劲。在开展解放思想的讨论中，胡耀邦提出了“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的“四不”主义，消除了大家的顾虑，对思想解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解放思想的同时，胡耀邦已开始着手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在中央党校的教学方面，胡耀邦大胆创新，先后开办了老年离退休干部班、老干部文化班、新疆班，并且着手为党的事业培养接班人，开始创办中青班。

除了做好各项工作外，胡耀邦始终坚持读书。这方面，对陈维仁的影响很大。胡耀邦不但读书多，而且阅读速度非常快。陈维仁发现胡耀邦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套《列宁全集》，重要的地方都作了标记。他提倡“每个干部要读2亿字的书”。一次，陈维仁问起这个话题，胡耀邦对他说：“每天坚持读几个钟头，几万字不多嘛！这样日积月累，2亿字不算多吧！”后来，胡耀邦每个星期回家几乎都给陈维仁捎两本书回来。

陈维仁说，当时虽然自己是胡耀邦的文字秘书，但很多讲话稿耀邦都亲自写。他胸怀坦荡，敢讲真话、讲实话，反对空

话、套话。陈维仁平时大量的工作是帮助胡耀邦拆阅信件。当时，全国的冤假错案堆积如山，给胡耀邦写信反映情况的特别多。用胡耀邦的话叫“冤案如山，步履艰难”。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调任中组部部长，仍然兼任中央党校的领导职务。这段时间陈维仁就成了胡耀邦与中央党校的联络人。在中组部，为了平反冤假错案，胡耀邦每周开一次碰头会，中央党校一般都是由陈维仁参加。对于一些找胡耀邦反映情况的人，胡耀邦说：“你们找不到我可以找陈秘书。”其后，胡耀邦先后任中宣部部长、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总书记直到中共中央主席。无论职务如何变动，他一直不忘中央党校，一直把陈维仁作为他与中央党校的联络员。

1988年8月，已从中央领导岗位退下来的胡耀邦在烟台疗养。陈维仁恰好也去了烟台，于是他便去看望了这位平易近人的老领导。一见面，陈维仁就问胡耀邦：“每天晚上还能坚持走一万步吗？”胡耀邦说：“现在只能走七千步了。”这天中午，胡耀邦留陈维仁在东山宾馆共进午餐。席间，胡耀邦问陈维仁的工作情况，陈维仁说，他已从中央副校长的位子上退到了二线。胡耀邦说：“退下来就要好好休息，第一是长寿，第二是长寿，第三还是长寿。”

过了三天，陈维仁又去东山宾馆看耀邦。一进房间，耀邦就十分高兴地说：“你来了！听说你要来，我昨晚一夜没睡着！”然后他走到桌子旁拿出一张写好的字说：“我写了一首诗送给你。”陈维仁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的是：

题赠陈维仁同志

碧海秋昊又相逢，忽闻退作长寿翁。

十载辛勤莫嗟少，栽得桃李到瀛蓬。

胡耀邦九月一日

看到耀邦赠给自己的诗，陈维仁非常感动，回到宾馆，他几经琢磨步着耀邦的诗韵和诗一首：

欣逢盛世喜相逢，潜心遵嘱作秋翁。
不入飘渺神仙界，青山仰止到黄蓬。

9月3日，陈维仁把这首诗转交给了耀邦夫人李昭同志。

回顾自己走过的路，陈维仁说，我本来是学经济学的，但在经济学上却无任何建树，因此谈起经济学，我很惭愧。然而值得欣慰的是，我这一生跟随了三位好领导，我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了许多人生教义。

一位永葆青春的共产党员

——沉痛悼念钱锡康同志

○本刊编辑部



钱锡康同志

钱锡康，1936年9月18日出生，江苏吴江人。1958年清华大学土木系毕业后留校工作。曾任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后勤党委书记、校党委常委、校史编委会委员，研究员。1992—2015年担任清华校友总会第三、四、五、六、七届理事会理事。1998年到校友总会工作，任《清华校友通讯》主编至2007年，后继续在校友总会从事研究工作至2015年。

2025年10月27日，钱锡康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钱锡康是一位将毕生精力奉献给党的教育事业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清华大学工作的57年间，他历经多个岗位，始终以学校育人事业为宗旨，用行动诠释了永葆青春的党员本色。从后勤改革的开拓者到校友工作的深耕者，他传承清华光荣传统和优秀历史文化，书写了一部共产党员的奉献之歌。

服从安排，辗转多岗

1936年，钱锡康出生于江苏吴江，后随家人搬迁到上海。父母对他细心培养、严格要求，同时，他受到从清华毕业的姑父和舅舅的影响，对清华产生了向往。1953年，《解放日报》刊登了清华录取名单，钱锡康看到自己的名字后高兴得跳了起来。他从上海出发，三天转了四次火车，抵达北京。后来，他时常回想起这段经历。

来到清华，钱锡康被分配到土木系给排水专业。在大学五年的25门课程中，他拿下24门课程的满分，成为同学们请教功